§ 历史学研究 §

宋代地方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考论
——以范成大蜀地任职为例

游 彪，胡正伟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00）

摘 要：在宋代，佛教深入民间社会，得到广大民众虔诚的信仰，在全国各地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宗教势力。作为朝廷的代表，各级地方官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南宋时期，范成大担任四川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任职期间他积极参与佛教界举办的各种佛事活动，这是其行政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他出席的政治意味远远高于宗教本身的意义。同时他还留下了大量诗作，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四川地方政府官员与佛教寺院、僧侣之间的特殊关系，也真实地再现了两宋时期普通民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关键词：宋代；地方官；范成大；佛教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3）03-0118-10

在宋代，随着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各地地方官员势必要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与宗教相关的各种事务。而在现实生活中，佛教是宋代民间最为普及的宗教信仰，因而地方官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密切而复杂。这种情况在宋代具有典型意义，是宋朝官员治理地方的政治常态，因而值得加以深入探索。南宋时期，范成大于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被任命为“四川管内制置使”，[①]名义上成为当地最高军政、行政长官，到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离开成都，除去其到任途中所需时间，他在四川任职大约是两年半左右。其间，他留下了大量有关其在四川地区从事各种活动的诗作。迄今为止，对于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加以考察，取得了相当丰硕而深入的成果。然而，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毕竟有实有虚，融入了作者个人的情感或想象力等等，因而将其视为直接史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尽管如此，范成大的这些诗作依然留下了非常丰富而真实的历史线索和讯息，这些诗篇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南宋时期四川地方政府与佛教寺院、僧侣之间的某些特殊关系，也较为真实地再现了两宋时期人们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一、参与其间：宋代地方官员与民间佛教法事活动

应该说，佛教寺院在中国古代似乎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宗教场所，而是有着各种不同功能的地方。范成大在四川任职期间曾经去过很多佛教寺院，尤其是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庙宇。实际上，古代的佛教寺院是举办各种活动的公共场所，作为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成都既是四川地区高级官员办公、居住的所在地，亦是西南、西北地区的重要都市。因此，范成大在四川任职期间写下了大量关于当地佛教寺院举办各种活动的诗作。

南宋孝宗淳熙三年正月初一，大体上应该是范成大初次在任职地过新年，他创作了《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一诗，虽然诗作中并未涉及多少该寺庙“礼塔”活动的盛况，但其诗下的注释说“成都一岁故事始于此，士女大集，拜塔下。然香挂旛，以禳兵火之灾。”[②]在范成大看来，成都每年的

作者简介：游彪（1965—），男，四川简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正伟（1978—），男，安徽滁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国家开放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2009JJD770008）
① 《宋史·孝宗本纪》。《宋史·范成大传》记载“改除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
②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故事”就是从安福寺礼拜塔开始的。然而何谓故事，他并未交待清楚。元朝人费著系华阳人，他著有《岁华纪丽谱》一卷，其中记载说　“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近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① 也就是说，凡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参与的岁时节日，大体上是有固定日子的，所以称之为“故事”。由此看来，在新年的第一天，人们穿着华丽的服装，有的骑马，有的乘车，在仪式中有精彩的演出，也有来自各地技、魔术之类的表演。从表面上看这是官员与普通百姓同乐，实际上则是地方官员为维护其更为有效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意味着宋朝的地方官需要同范成大一样积极地参与当地的各种宗教活动，以便拉近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这样既有利于安抚民心，更有助于官方政策的实施。由此看来，安福寺当天应该是非常热闹，很多人会到该寺内的一座塔下去焚香并在上面悬挂东西以祈祷消除“兵火之灾”。这与费著的说法是一致的　“正月元日，郡人晓持小彩幡，游安福寺塔，粘之盈柱，若鳞次然。以为厌禳，惩咸平之乱也。塔上燃灯，梵呗交作，僧徒骈集。太守诣塔前张宴，晚登塔眺望焉。”这一记载较之费著自己解释成都“故事”时的说法更完整、清晰，也更多地透露出这一活动的诸多真实的历史讯息。

首先，从上述史料可以推断出来，安福寺礼拜塔的各种活动看来是从宋朝开始兴起的，该寺举行这一法事活动应该是宋真宗以后的事情，至于兴起的确切时间就不得而知了。咸平三年（1000），成都发生了王均之乱，不仅改了年号，还建立了大蜀政权。这对于赵宋王朝来说是建立了国中之国，于是朝廷出兵平定了叛乱。加之宋初平定后蜀的战事，宋太宗时期又出现了王小波、李顺反抗朝廷的事件，短短几十年间，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多次经历战火，这给生活在当地的居民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因而他们对战火的恐惧远远超出了宋朝境内其他地区的民众，于是逐渐出现了在安福寺祈求平安的活动。这一法事活动的影响此后变得越来越大，成为成都地区新年第一天最为重要的民间活动。对宋王朝统治者而言，在同样的时间内益州多次建立非赵姓政权，对朝廷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而除了大力增强统治力量之外，顺应民间的意愿也成为其笼络政策的重要层面。于是，管辖成都地区的朝廷官员到安福寺的塔前设宴会，这显然有着某种政治意含，而不是单纯的祈祷法事。

其次，宋朝出现在安福寺的礼塔活动何以不在其他场所举办，其背后一定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以常理而论，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在宋代应该有数量众多的佛教寺院，何以偏偏要在安福寺塔周围举办呢？宋人祝穆引用《成都志》的记载说，安福寺塔“大中间建塔十三级，李顺之乱，塔毁于火。祥符间重建，仍十有三级。初，取林（材？）岷山，得青石中隐白画浮屠像十有三级，梁柱栏楯，皆历历可观，此建塔之神异也”。② 可知安福寺塔建于唐代大中年间，毁于李顺反叛，重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并且建塔初期就曾经出现过神异之事，因而颇具特点。南宋陆游作了《雨中登安福寺塔》一诗，并注释说“俗谓之黑塔”，③ 这应该就是指北宋新建的那座塔了。可能是王均之乱后，当地人祈求平安，常常前往礼拜，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习惯，进而成为了专门祈祷消除“兵火之灾”的庙宇。问题在于，民间流传这种习俗的背后应该存在某些不为人知的推动力，这些因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无疑是相当复杂的，后人已经很难了解其中的奥秘了。

再次，对于佛教寺院和僧人而言，由于当地地方行政长官的到来，礼塔仪式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官方举办并参与的重大活动。为了办好这一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节日，迎接以范成大为首的地方官，安福寺塔除了要燃灯之外，还“梵呗交作，僧徒骈集”，即所有僧人集中起来诵唱经文，应该是相当隆重而庄严的佛教法会。按照费著的说法，太守会在安福寺停留整整一天，晚上登上安福寺塔眺望美景。而事实上，范成大是否直到晚间仍然在安福寺，现已无从考证，但其诗作最末用了“与民同处且逢场”一句，表明他无非是为了表现亲民态度而逢场作戏罢了。

① 费著　《岁华纪丽谱》，四库全书本。以下所引费著记述皆出本书，不一一标注。
② 祝穆　《方舆胜览》卷五一，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
③ 陆游　《剑南诗稿》卷七，长沙：岳麓书社，1998 年。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同年正月初三，范成大来到了成都东郊的牌楼院，这也是一座佛教寺庙。他解释说“故事祭东君，因宴此院。蜀人皆以是日拜扫。”① 也就是说，这一天是当地人扫墓拜祭祖先的日子。按照范成大的理解，应该是当地行政官员要参与的祭祀活动，祭祀仪式之后，在牌楼院设置宴会。然而，费著在记述这天的事情时却说“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旧名牌楼院）。”费著记述的时间与范成大所述并不一致，一是初二，一是初三，其中必定出现了问题。若按照费著关于“故事”的说法，范成大前往成都东郊的牌楼院参加相关活动应该是固定的日子，而范成大当年是亲自来到了该寺院，因而其诗作记述的时间很难说是错误的，抑或是他并未按照惯例前去，这是无法考证的事实。同样，目前也无资料能够充分地证明，费著对成都牌楼院法事活动具体时间的记忆性叙述是否准确。但无论如何，范成大的确象征性地参与了该寺院主办的“蜀人”祭祀先祖的活动，其诗作云“远柳新晴暝紫烟，小江吹冻舞清涟。红尘一閧人归后，跕跕饥鸢蹙纸钱。”② 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当时“蜀人”在烟雾缭绕中给死去的先祖焚烧纸钱的场景。然而，对于担任地方长官的范成大而言，他的祖先远在平江府（江苏苏州），因而可以不参加牌楼院祭祖仪式。然而，范成大按照惯例来到了牌楼院，亲自出席了“蜀人”祭祀其祖先的法事活动。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范成大个人的行为，而是每个宋代地方官都必须面对的事情。他们为官一方，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必须尽可能地融入当地社会，顺应当地民心，否则会给他们的执政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宋代地方官员参与任职地的宗教活动甚至可以说是极为重要的行政过程。至于“蜀人”何以在牌楼院举行“拜扫”仪式就不得而知了，抑或该寺院寄放了很多“蜀人”祖先的灵位，抑或该寺庙祭祖有着某些特别的灵验等等，这些都有待于今后研究的深入。

范成大在成都任职之后写过一首《丁酉重九药市呈座客》的诗，应该是作于淳熙四年九月初九。此时范成大已经离开任职地，因而应该是他回忆成都药市而作。③ 显而易见，即便是离任了，范成大对成都大慈寺的药市依然有着深刻的印象。可以肯定，他参加过在大慈寺举办的药市活动，因而才会产生恋恋不舍的情感。“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者，于是有于窗隙间呼货药一声。人识其意，亟投以千钱，乃从窗隙间度药一粒，号解毒丸，一粒可救一人命”。④ 毫无疑问，每年大慈寺在天中节、重阳节这两天都要进行各种商业活动，这也是“故事”，是属于有固定时间的活动，也是需要地方行政长官参加的。在此之前，范成大似乎并未去过药市，至少在其诗作中不曾反映出来。然而，这种情况似乎是难以想象的，毕竟，范成大蜀地任职已经到了第三年。而大慈寺既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佛教庙宇，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是极具影响力的，同时也是成都最为重要的商业贸易场所之一，更是当地举办各种世俗和宗教活动的著名寺院。范成大曾经创作过一首题为《会庆节大慈寺茶酒》的诗“霜晖催晓五云鲜，万国欢呼共一天。澹澹煖红旗转日，浮浮寒碧瓦收烟。衔杯乐圣千秋节。击鼓迎冬大有年。忽憶捧觞供玉座，不知身在雪山边。”⑤ 可以肯定，这是庆祝当朝皇帝宋孝宗生日而由范成大在大慈寺内主持的盛大而隆重的活动。⑥ 由此可知，当地官方的不少政治活动也是在大慈寺内举行的。正因为如此，范成大在写作《丁酉药市呈座客》之前极有可能已经多次去过大慈寺的，无非是没有留下相关证据而已。

从现存范成大的诗作可以发现，他留下了三首关于海云寺的诗，其名分别是《十二月十八日海海云赏山茶》、《三月二十三日海云摸石》、《十一月十日海云赏山茶》。作为成都东门外最为著名的风

①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七。
②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七。
③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七有该诗诗序云“余于南北西三方，皆走万里，皆遇重九，每作《水调》一阕。燕山首句云‘万里汉家使’，桂林云‘万里汉都护’，成都云‘万里桥边客’。今岁倦游甚矣，不复更和前曲，乃作此诗以自戏。”
④ 《铁围山丛谈》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⑤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七。
⑥ 《挥麈前录》卷一云“今上皇帝十月二十二日生，为会庆节。”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景之一，海云寺有着特殊的地位，也是游人如织的寺庙之一。“东门之胜，禹庙、大慈寺、散花楼、合江亭、薛涛井、海云寺，其最著者”。① 该寺距离城区相对较远，但庙中的一株山茶树可谓闻名全国。施宿系南宋时期湖州人，他并未亲自去过四川，但在纂修吴郡（浙江绍兴）的地方志时专门设了“草部”一门，其记述吴郡的风土时竟然谈到了蜀地的山茶“蜀地乃绝少，成都海云寺仅有一树。每岁花发，则蜀帅率郡僚开燕赏之。邦人竞出，士女络绎于路，数日不绝。”在施宿看来，会稽（浙江绍兴）有很多山茶树，“今会稽甚多，昌安朱通直庄有树高三、四丈者”，② 但其声名远远不及成都海云寺的这株山茶，可知在宋朝是相当有名的，就连远在江南的官员都称赏不已。著名诗人陆游在一首诗的注释中写道“成都海云寺山茶花一树千苞，特为繁丽。”③ 陆游曾经在四川任职多年，他与范成大几乎同时在任，只是较范成大晚一年左右回到东南地区而已。后来，他是在一户人家见到山茶树时触景生情，回忆起了海云寺极为繁丽的山茶。可以肯定，陆游与范成大一样也观赏过海云寺的山茶树，否则他不会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海云寺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唐代的一位高僧。据费著记述，“（三月）二十一日出大东门，宴海云山鸿庆寺……盖开元二十三年，灵智禅师以是日归寂，邦人敬之，入山游礼，因而成俗”。可知鸿庆寺延续了唐朝后期以来逐渐形成的习俗，每年三月二十一日都要在该寺庙纪念灵智禅师。随着时代的变迁，该寺的民俗活动变成了求子的风俗，这实际上成为海云寺香火鼎盛的重要原因。北宋人吴中复作《海云寺唱和诗》，而王霄为该诗作序时写道“成都风俗，岁以三月二十一日游城东海云寺，摸石于池中，以为求子之祥。”④ 费著也记述说“山有小池，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可知这种习俗至少在元代依然传承，甚至一直流传到了明清或近代时期。显而易见，在中国古代极为重视传宗接代的儒家文化背景下，海云寺“摸石”之后便能生育男孩，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大加信奉。因而不难想见，该寺庙在宋朝之后的历代王朝一定是热闹异常，来往的香客应该是源源不断的。至于从何时开始形成这一习俗，现已很难加以求证了。

为了顺应民间的这种需求，宋朝的地方官往往都要参与类似海云寺的求子活动，这是维系当地社会秩序的重要环节之一，范成大自然也不会例外。从其诗作看来，范成大至少去过三次海云寺，两次观赏山茶树，一次观看“摸石”活动。至于他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官员身份前去，等等，这些都并不是十分明确。但无论如何，范成大是四川制置使，他去参加在海云寺举办的活动，更多的应该是代表官方出席的，其仪仗之威严，引得沿途百姓夹道观看“太守出郭，建高旗，鸣笳鼓，作驰骑之戏。大宴宾从，以主民乐。观者夹道百里，飞盖蔽山野，欢讴嬉笑之声，虽田野间如市井，其盛如此。”⑤ 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范成大多次前往海云寺主持“民乐”仪式，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从表面上看，宋代官员积极参与民间大型的宗教活动，是与民同乐，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而实际上，不论是在哪座佛教寺庙举办的宗教或世俗活动，其强化在区域社会的统治的目的是难以掩盖的。

二、游历佛教寺院：真实再现宋代地方官的业余生活

在四川任职两年半之后，范成大从成都经由水路返回南宋都城临安（浙江杭州）。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出身于东南地区的官员而言，要到西南地区担任相应的职务，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抉择，毕竟是远离故土和亲人，在任职期间与他们原来的关系网罗之间的联系自然不如以前频繁，然而，为了未来仕途的发展，他们又不得不前往遥远的任职地，这无疑是宋代官僚制度设计的进步之处。在交通并不便利的情况下，范成大的归途是遥远而艰辛的。

范成大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离开成都，从此暂时离职，他的归程似乎变成了游览各地美景的旅

①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四库全书本。
② 《嘉泰会稽志》卷一七，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
③ 陆游《剑南诗稿》卷一六《人日偶游民家小园山茶方开》。
④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
⑤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五。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途，其中相当重要的游览场所就是佛教寺院。虽然此前范成大一行曾经停留过青城的罗汉院，但严格说来，他在回程中真正游历的第一所佛教寺院是中岩，此处“号西川林泉最佳处”，[①]为西川地区风景最为优美的地方，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佛教道场。据范成大记述“去眉州一程，诺讵罗尊者道场。相传昔有天台僧遇病僧与之木钥匙，云：异时至眉州中岩，扣石笋，当再相见，后果然。今三石屹立如楼，观前两楼纯紫石，中一楼萝蔓被之。傍有宝瓶峰，甚端正。山半有唤鱼潭，慈姥龙所居。世传雁荡大小龙湫亦诺讵罗道场，岂化人往来无常处耶?”[②] 显而易见，范成大对眉州（四川眉山）的诺讵罗道场似乎是有所怀疑的，毕竟宋代有两处非常出名的同名佛教神灵的道场。其实，关于诺讵罗，中土的佛教典籍曾经有过说明，传说释迦牟尼传法给大迦叶，几经传授，“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并眷属等，令其护持，使不灭没”，其中排在第五位的尊者就是诺讵罗，他与其属下八百罗汉“多分住在南赡部洲”。[③] 姑且不管中岩佛教寺庙传说的真实性，但历经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岩俨然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之一，于是范成大等人才慕名而至。

范成大一行六月十四日早晨离开眉州，经过半天水路行程，中午抵达中岩。在游览了寺庙奇石林立的山水之后，范成大写下了一首诗作“赤岩倚竛竮，翠逻森戍削。岑蔚风气重，稀间暑光薄。聊寻大士处，往扣洞门钥。双撑紫玉关，中矗翠云幄。应供华藏海，归坐宝楼阁。无法可示人，但见雨花落。不知龙湫胜，何似鱼潭乐。夜深山四来，人静天一握。惊看松桂白，月影到林壑。门前六月江，世界尘漠漠。宝瓶有甘露，一滴洗烦浊。扪天援斗杓，请为诸君酌。”[④] 若将这首诗与范成大所作的诗序结合起来看，他在中岩寺庙应该是一直停留到了晚上，因为该诗中出现了“夜深”、“月影”等从很大程度上说是写实的词句，且其自述的当夜的情形“初夜，月出东岭，松桂如蒙霜雪，与诸人凭栏极谈。至夜分，散。”[⑤] 由此看来，上述诗句应该是当晚创作的，这短短数句所述的情境与上引诗句描述的景色是相互吻合的。具体而言，他们当晚住在该寺院中，大概是因为当夜雾气很重，他们在寺院的楼阁中多次看到了忽隐忽现的山峦。他们还来到了传说中天台僧人扣击石笋并与诺讵罗尊者相见的洞门前，寻找遗留下来的痕迹。范成大感触良多，于是创作了称颂中岩景致的诗篇。

根据其相关诗作甚至可以进一步判定，范成大及其一行人游玩过程中似乎遇雨，因而在中岩多停留了一天。六月十五日，原本为范成大送行的人应该在中岩的寺院相互道别，“早食后，与送客出寺，至慈姥岩前徘徊，皆不忍分袂”，因而他们一行又在岩下“小饮”，恰恰之后不久，风雨大作，“慈姥岩与送客酌别，风雨大至，凉甚”。于是范成大与送他的人一道“清饮终日”，吟诗作赋，“诸贤用中岩韵各赋饯行诗，纷然擘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范成大一行只好下山，“复入宿寺中”，[⑥]可知他们在寺院多停留了一天。由此可知，尽管范成大已然卸任四川制置使的职位，但其亲朋故旧仍然陪同他一起到了距离成都很远的地方，这是宋代政治生活中非常特殊的现象，值得高度关注。若仅仅是按照儒家传统的情义观来加以理解，恐怕只是表面文章，是难得要领的。

六月十六日，范成大一行从中岩出发，“与送客先归者别”，[⑦] 即一部分送别之人离开了范成大。次日，他们一行来到了嘉州（四川乐山），游览著名的凌云寺。在其诗作《凌云九顶》之下有注释说“即大石佛处。初登山时，岩壁上悉镵为小佛，不知其数。山前佛头滩受雅江之冲，最为艰险。”[⑧] 可知范成大当时登山之时，在大佛周边的岩壁上尚能清楚地看到前人雕刻出来的无数小型佛像。当他们一行登上凌云寺后，范成大描述了当时他所见到的大佛及其相关情况“寺有天宁阁，即大像所在。嘉为众水之会，导江、沫水与岷江，皆合于山下，南流以下犍为。沫水合大渡河由雅州而

①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②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八。
③ 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四〇《罗汉部》。四库全书本。
④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八。
⑤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⑥ 本段所引分别出自范成大《吴船录》卷上及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八。
⑦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⑧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八。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来，直擣山壁，滩泷险恶，号舟楫至危之地。唐开元中，浮屠海通始凿山为弥勒佛像以镇之。高三百六十尺，顶围十丈，目广二丈，为楼十三层。自头面以及其足，极天下佛像之大。两耳犹以木为之。佛足去江数步，惊涛怒号，汹涌过前，不可安立正视，今谓之佛头滩。佛阁正面三峨，余三面皆佳山，众江错流诸山间，登临之胜，自西州来，始见此耳。”①

归纳其记述所言，一是该佛像是天下最大的佛像；二是修建该佛的目的在于镇住激流汹涌的江水，以避免舟楫翻覆；三是该佛像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是由海通和尚主持修建的；四是该佛像位于高达十三层的天宁阁之内，即有巨大的楼阁罩住了大佛像。然而，唐朝开凿大佛时的楼阁并非如此，“沙门海通于嘉州大江之滨凿石为弥勒佛像，高三百六十尺。覆以九层之阁，扁其寺曰陵云”。②可知唐朝该寺院名曰陵云，而非凌云，更为重要的是，唐朝所建的楼阁是九层，而非十三层。至于是何时、何人改名，又是何时、何人重建为十三层楼阁，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有待加以细致考证的。

事实上，范成大一行到达嘉州之后很快便去游历了凌云寺，大体上应该是正午时分参观的。其诗作《凌云九顶》云：“聊为东坡载酒游，万龛迎我到峰头。江摇九顶风雷过，云抹三峨日夜浮。古佛临流都坐断，行人识路亦归休。酣酣午枕眠方丈，一笑闲身始自由。”③从诗句描述的情境来看，基本上属于写实性质。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酣酣午枕眠方丈，一笑闲身始自由”两句，表明当天中午范成大是在凌云寺住持的住所午休，明显抒发了摆脱政事烦扰的愉悦之情。更为重要的是，从此诗的内容几乎可以肯定，当时凌云寺住持应该是接待了范成大一行人，甚至是陪同他们参观了大佛及寺庙，因而该寺住持才能将自己的卧室让给已经离职的地方长官作暂时的休息之所。

从九顶下山之后，范成大一行来到了一座名为广福院的寺庙，“中有水洞，静听洞中，时有金玉声，琅然清越，不知水滴何许作此声也”。④陆游也有类似的记述：“汉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间，时闻洞中泉滴声，良久一滴，清如金石。”⑤此寺庙原本因为有泉水发出的金玉之声而得名东丁院，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被贬黜蜀地时将其更名为方响洞，并为该洞题诗云：“古人名此东丁水，自古丁东直到今。我为更名方响洞，要知山水有清音。”⑥然而，该诗有着多种版本，且文字存在差异。⑦至少从南宋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此诗为黄庭坚所作。然而，在黄庭坚的文集中却不见此诗，因而笔者以为，此诗并非黄庭坚的作品，而应该是其他人附会之作，只是利用了黄庭坚的声名而已。由于后世之人极为爱慕黄庭坚，加之时人口口相传此一诗作，致使范成大、陆游等人也信以为真。尽管如此，广福院作为嘉州城内著名的寺庙，且有黄庭坚之类的大文豪为其更名，因而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范成大便是其中之一。

此后，范成大在嘉州连续休整了五天，主要原因是频繁的迎来送往，确如其记述：“遣近送人马，归者十九。”也就是说，在此数日内，大部分为范成大送行之人陆续离开，无论是出于某些政治原因，还是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很多故旧都在范成大离开成都的途中来与他相互道别。实际上，有不少人并非从当时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成都来的，而是从各地赶到范成大所乘船只沿途停泊之处，其游记中出现了某人从某处来之类的记述，如六月七日，范成大从青城县出发，“同年雅州守何正仲子方来见，招游其群从园林”。⑧何正仲与范成大是绍兴二十四年（1134）同年考中进士，⑨应该是早就相识的。虽是同年进士，但他们仕途的差别显然是巨大的，已然完全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何正仲并非自己前来青城送别，而是带着数量不少的随从。这些人出于何

①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② 《佛祖统纪》卷四〇《法运通塞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③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八。
④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⑤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
⑥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⑦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古人题作东丁水，自古东丁直到今。我为改名方响洞，要知山水有清音。”《蜀中广记》卷一一：“古人题作丁东水，自古丁东直至今，我为更名方响洞，信知山水有清音。”
⑧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⑨ 《宋史·范成大传》。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种缘由从雅州（四川雅安）前来青城，是奉上司何正仲之命，抑或是专程前来为范成大送行，这两种动机显然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解读，也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些人与范成大之间的或私或公的关系。他们与范成大一同乘船离开青城，至于何正仲一行何时离船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至嘉州，来自四川地区的官员恐怕该来的都来过同时也离开了，因而仅留下少数人陪同前往峨眉山游览。

六月二十五日，范成大一行从峨眉县城西门出发开始攀登大峨山，其沿途经过了慈福、普安两座寺庙，在华严院稍作休息，便来到了中峰院，这是当时峨嵋山中相当重要的寺院。“院有普贤阁，回环十七峰绕之。……下有茂真尊者庵，人迹罕至，孙思邈隐于峨眉，茂真在时，常与孙相呼、相应于此云”。① 由此可见，南宋时期，峨眉山就已经有了数量众多的佛教寺院，且每个庙都有其自身的特色。诚然，所有这些故事无疑都是无从查证的传说，其真实性是很难经得起检验的，但正是有了药王孙思邈、茂真尊者等等这些历史名人曾经隐居峨眉山，方能不断扩大当地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离开中峰院之后，范成大一行来到牛心寺、白水寺，前者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僧人继业开创的，“牛心寺三藏继业，自西域归过此，将开山，两石斗溪上，揽得其一，上有一目，端正透底，以为宝瑞，至今藏寺中”。② 也就是说，继业准备在峨眉山建立佛教寺庙之时，出现相当神异的现象，两块石头相互争斗于溪流之上，继业抓到了其中一块，石头上还有一只眼睛，于是继业在此创建了牛心寺。可以肯定，这种说法是无法让人信服的。然而，继业前往西域取经则是真实的，据南宋史家李焘记载，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人请游西域，诏许之。仍赐钱三万遣行”。而且，这些僧人的确到达了西域各地，甚至还去了大食国。开宝元年（968），即行勤等人离开宋朝两年之后，大食国派遣使者到宋朝贡献“方物”，其原因就在于宋太祖让行勤携带了宋朝的国书，行勤应该是交给了大食国王。“先是，僧行勤游西域。上因赐大食国王书，以招怀之”。③ 可知宋初官方曾经派遣过多达150名出家人游历西域各地，而继业就是其中之一。“业姓王氏，耀州人。隶东京天王院。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寺”。④ 这是范成大所记述的继业的简历，应该是他在牛心寺搜集到的重要资料。显而易见，范成大与李焘以及其他人的记述之间存在很大差别，⑤ 一是宋朝派遣和尚的人数，一说150人，一说300人，一说157人；二是行勤等人出发的时间，一说乾德二年，一说乾德四年；三是两者对行勤等人游历西域的目的予以了不同的叙述。但不能否认的是，不管是哪种说法，宋太祖派遣的西行僧人数量众多，可以肯定，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派出的规模最大的取经使团，其在中国佛教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僧人回到中土之时，宋朝政局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太祖之弟宋太宗赵光义登上了皇位，因而他是决然不会重视太祖派遣出去取经的这批僧人的。更为重要的是，太宗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大位，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之下是格外忌讳的话题，此后，这些僧人的行踪便消失在了宋代官方的记录之中，他们的命运也随之沉浮，四散而去。作为陕西出身的和尚，或许是逃难而来，抑或是躲避祸害的缘故，继业来到峨眉山，并在此定居下来，经过百般努力，终于建立了牛心寺。

然而，范成大记述了另外一种说法：“牛心本孙思邈隐居，相传时出诸山，寺中人数见之。小说亦载招僧诵经，施与金钱，正此山故事。”⑥ 也就是说，在继业来到之前，此处已然存在一些孙思邈隐居的遗迹，且寺庙中的人多次见到过他，甚至有小说家言其举办过招集僧人念诵佛经的活动。当然，这些都无从确证，基本可以肯定是荒诞不经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古代人们祈求身体健康的一种反映。毫无疑问，峨眉山及其更远的区域大体上都流传着这些或真实或虚假的

①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②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三月癸未，卷九开宝元年十二月乙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④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⑤ 《佛祖统纪》卷四三：“（乾德）四年。诏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时沙门行勤一百五十七人应诏。所历焉耆、龟兹、迦弥罗等国。并赐诏书、谕令，遣人前导。仍各赐装钱三万（行装钱三十贯文）。”可知对行勤等人西域求法的记述多有矛盾之处。
⑥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各种故事，且传播的范围愈发广泛，于是使该山在民间的声名和影响力都大为提升。而继业等人便逐渐开始在峨眉山传播佛教，其所利用的就是这种十分有利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白水寺成为峨眉山最为重要的佛教寺院，似乎是从宋朝开始的。虽然该寺院早就建立起来，但在宋朝之前似乎并不是非常出名，其在当地的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宋朝开国以后，白水寺作为普贤的道场而受到赵宋皇室的高度重视，几乎每代宋朝帝王都曾经派人前往白水寺，或修建寺庙，或铸佛像，或从事其他佛事活动。开宝四年（971），由于嘉州地方官多次上奏朝廷说白水寺出现了普贤的身影，于是宋太祖赵匡胤“勅內侍张重进往峨眉山普贤寺庄严佛像”。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勅內侍张仁赞往成都铸金铜普贤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山普贤寺之白水，建大阁以覆之。诏重修峨眉五寺，即白水普贤、黑水华严、中峰、乾明、光相也”。[①]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正月，“有中使自峨眉山还京师”，[②] 这说明此前宋真宗就派遣宦官前往峨眉山，尽管不了解其具体任务，但可以肯定他是奉命去了峨眉山并于此时回到了京城。据范成大记载，他参观普贤寺并拜谒了普贤的铜像，如上所述，该铜像是宋太宗派人在成都用金、铜浇铸而成的，高达两丈之多，应该是非常沉重的，它是如何从成都搬运到峨眉山的，这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范成大在白水寺中游览参观时发现，“有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所赐御制书百余卷，七宝冠、金珠璎珞、袈裟、金银瓶钵、奁炉、匙箸、果垒、铜钟、鼓、锣、磬、腊茶、塔、芝草之属。又有崇宁中宫所赐钱幡及织成红幡等物甚多”。很显然，这些物件应该是范成大亲眼所见，宋初三朝皇帝赏赐给普贤寺的御制、御书就多达百余卷，每个皇帝平均在三十多卷，还包括众多的金银珠宝和寺院日常生活用品以及代表祥瑞的宗教用品，等等，其数量之多，不难想见，几乎是每年都有不同类型赏赐。这种情况对于宋代寺院而言是非常罕见的殊荣，从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白水寺在宋代宗教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可以肯定，这些东西在历史上一直藏在白水寺中应该是真实可靠的，至少到南宋时期依然还在，范成大见到了这些物品就是确凿的证据，尤其是御书，寺院、僧人无论如何是不敢轻易伪造的，范成大甚至还引用了宋仁宗亲自书写在赏赐给普贤“红罗紫绣袈裟”上的发愿书中文字，“佛法长兴，法轮常转。国泰民安，风雨顺时。干戈永息，人民安乐。子孙昌盛。一切众生，同登彼岸。嘉祐七年十月十七日，福宁殿御札记”。[③] 仔细分析这些文字就不难发现，此时宋仁宗正因为无子嗣继承皇位而烦恼不已，因而特别渴望能够“子孙昌盛”，这其实是道出了仁宗皇帝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不难想见，宋仁宗将当时最为忌讳也最为敏感的话题写在看似祈求国泰民安的冠冕堂皇的文字当中，足以证明白水寺及普贤信仰在宋朝皇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令人万分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赵宋皇帝赏赐却在后来的岁月中逐渐散失了，至今不见任何踪影。

事实上，范成大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停留于白水寺的，由于当天下大雨，不能登山，因而他有闲暇时间更加充分地参观该寺庙的各种建筑。该寺经藏“亦朝廷遣尚方工作宝藏也。正面为楼阙，两旁小楼夹之。钉铰皆以碉石，极备奇靡。相传纯用京师端门之制”。[④] 由此可见，白水寺的藏经楼修建得极为豪华，是朝廷派遣御用工匠修造的，完全是按照北宋都城东京（河南开封）的样式制作的，而端门为皇城的正南门，《宋史·地理志》载“皇城周回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南面三门，中曰端门，东西曰左、右掖门”。通常而言，这种情形是违背宋代礼仪制度的，显而易见，白水寺藏经楼的建设应该是得到宋朝最高层特许的，其规格之高不难想见。更为重要的是，该楼所藏佛教经典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卷首悉有销金图画，各图一卷之事。经簾织轮相铃杵器物及‘天下太平’、‘皇帝’、‘万岁’等字于繁花缛叶之中，今不复见此等织文矣”，[⑤] 可知其所藏佛经与赵宋皇室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宋代白水寺及其所供奉的普贤和尚的影响力得以大幅度提升，甚至

① 《佛祖统纪》卷四三。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正月己卯。
③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④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⑤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可以说，经过以宋代皇室为首的各级政府和官员的大力推崇，峨眉山作为普贤道场的崇高地位才最终确立起来，此后便成为中国远近闻名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而范成大当时见到白水寺的情境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佐证，尤其是这些都是他实地考察的见闻，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在白水寺滞留一天后，范成大一行为了尽快登上峨眉山顶，专门在白水寺设斋供，“祷于大士，丐三日好晴以登山”。这表明，范成大当时的心情应该是非常急切的，极可能是希望节省时间，早一些踏上归乡之途。但在四川的雨季，他担心出现连续的雨天，因而只好向普贤和尚祈祷。次日，天气放晴，范成大等人从白水寺侧门出发开始登顶行程，“自此至峰顶光相寺七宝岩，其高六十里”。然而，就是这短短的六十里山路，却是相当艰险，于是范成大一行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斫木作长梯，钉岩壁，缘之而上，意天下登山险峻，无此比者”。由此可知，至少在南宋时期之前，峨眉山似乎并无较为完善的登山梯级，而是要依靠诸多辅助工具才能登上山顶，同时也需要很多人力加以协助。“余以健卒挟山轿强登，以山丁三十夫，曳大绳行前挽之。同行则用山中梯轿”。① 尽管不知道范成大是否付给这些“山丁”相应的费用，但从其登山的过程来看，应该是非常艰难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曾经在蜀地担任过行政长官的范成大，此番离任旅行显然并不是凭其一己之力就能够顺利实现的，而是得到了外力的支持，尤其是当地官员的精心协调与安排。由此看来，范成大之游历峨眉山，明显是发挥了他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这应该是宋代地方政治运作的常态表现，也是宋代官员之间各种复杂关系的重要层面之一。

经过一整天时间，范成大一行终于登上了峨眉山顶峰。“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登大峨之巅，一名胜峰山，佛书以为普贤大士所居”。这说明范成大对这一天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其诗作中很少出现具体的某年、某月、某日的记述，足见这一天在其一生中是具有特殊意味的。由于“连日光相大现”，于是范成大“赋诗纪实”，并“属印老刻之，以为山中一重公案”。② 在范成大自己看来，这首抒发登上峨眉山山顶的诗作是有其纪实性质的，因而嘱咐峨眉山的和尚加以刊刻，以流传后世，作为他曾经留下足迹的重要证据。应该说，这首宋代极为罕见的描绘峨眉山顶景致的长诗，对于中国的佛教重地而言，是具有特殊价值的。

事实上，与范成大一道游历峨眉山的人并不是很多，包括他的幕僚简世杰、杨光、周杰德。很明显，他们的身份十分特殊，其职责当然是帮助范成大处理各种事务，极为类似于清朝时期的师爷，这一群体在宋代颇为值得关注。此外，还有进士虞植和范成大的弟弟范成绩。在他们登顶之后，“复有同年杨（孙下心）伯勉、幕客李嘉谋良仲自夹江来”。③ 也就是说，与范成大同年考中进士的杨（孙下心）和他的另外一个幕僚李嘉谋从夹江来与他们汇合，其目的应该是为范成大送行的。由此可知，范成大在成都任职期间，至少有过四个为其出谋划策抑或是负担其他使命的“幕客”，其数量之多着实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更何况，其他三名幕客都跟随在范成大身边，而杨（孙下心）却单独前往夹江，其中定有特殊的缘由，只是缺乏具体史实而难以探究而已。这些情况都折射出宋朝政治的复杂性，同时也大体上勾勒出了以范成大为代表的宋代各级官员任职期间的人际关系网络。

三、结 束 语

姑且不论四川地区佛教在宋代所占有的位置，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范成大在蜀地任职期间与佛教界之间的往来经历的确是宋代地方官员具有较为典型意义的个案。依笔者愚见，宋朝其他地区任职的官员恐怕也会有着类似的行政经验，无非是因地域差异而从事不同的宗教活动而已。总体而言，尽管宋代各地存在具有当地特色的宗教信仰，但可以肯定的是，佛教无疑是宋代民间最为普及的宗教，这一点从现存宋代地方志所记述的各种庙宇的数量即可得到充分的证明。范成大在治理蜀地的过程中，

①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②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八。
③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多次参与佛教寺庙举办的各种民俗活动。实际上，这种情形似乎并非范成大一人任职期间有过如此作为，北宋以来的其他担任四川地区的官员也采取类似的作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范成大是延续前人的“故事”而已。显而易见，无论是范成大，还是其他在蜀地任职的宋代地方官，他们都积极地参与各个寺庙主办的佛事或其他活动，这些无疑是其行政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出席的政治意味非常浓烈，可以肯定要远远高于宗教本身的意义。

另一方面，对于远离宋朝统治中心的西蜀地区而言，范成大之类的地方官员与其他宋朝疆域内的朝廷命官一样，是代替以皇帝为首的朝廷行使职权，可以说是万民之上的最高主宰，他们在当地几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当然，宋代地方官的责任也是巨大的，他们的职责就是要维护所辖地区的稳定，否则是很难保住官位的。更何况，按照宋代政治制度的设计，他们是有任期限制的，不太可能长期在某地任职，因而为了未来的仕途，宋代地方官势必要尽可能处理好与当地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佛教作为宋代民间非常重要的力量，范成大等宋朝的地方官员不得不频繁莅临佛教寺院参加各种活动。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西蜀之地历来为宋朝中央政府所重视，加之北宋初年以来该地区多次出现反抗朝廷的事件，因而在任命当地行政长官时格外审慎。费著记述说“宋朝以益州重地，尝谋帅，以命宋公祁。宰相对曰：蜀风奢侈，祁喜游宴，恐非所宜”。由此可见，北宋以来一直精心挑选担任该地高级官员，其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范成大之任四川制置使恐怕也是宋孝宗君臣权衡各种因素以后作出的决定，加之他本人是当时朝野上下非常著名的文人，其未来的仕途和影响力是不同于普通地方行政长官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任职期间，自然会利用各种手段和机会累积人脉，结交各色人物，因而其与佛教界之间的交往就不难理解了。关于这一点，从他离职之后的种种活动是完全可以得到证明的。甚至可以说，对于范成大而言，这不单单是归乡行程，更是一次对其影响巨大的政治活动。虽说迎来送往乃是人情之常，宋代官员自然也无例外，但这一过程中明显透露出来了相当丰富的政治讯息。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宋朝皇室对峨眉山的特殊情感，以及他们对普贤和尚的竭力崇奉和丰厚的供养，这不仅给白水寺等寺庙留下了精美的宫廷用品以及宋朝皇帝的墨宝，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举措使峨眉山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两宋时期得以大大提升，并逐渐固定下来。此后峨眉山声名远播，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名山之一。

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Officials and the Buddhist Community in So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n Fan Chengda's Public Office in Sichuan

You Biao, Hu Zhengwei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00)

Abstract: In Song Dynasty, Buddhism was a popular worship and an influential Buddhist community emerged in the country.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oyal Court, local officials of different ranks had an intricate relation with the Buddhist community. Fan Chengda, governor of Sichuan in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 was involved in many Buddhist activities,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political career. His presence on such occasions conveyed a much greater political symbolism than its religious significance. He also produced a lot of poems, which reflected in a large degre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officials in Sichuan and the Buddhist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colorful social life of the ordinary people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local officials, Fan Chengda, Buddhism

（责任编辑：黎　原）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